

隆重纪念美学家 文艺理论家 雕塑家王朝闻先生百年诞辰



王朝闻作《毛泽东选集》封面浮雕(1950年作于北京)



王朝闻先生与夫人解驭珍同游杜甫草堂(1980年,成都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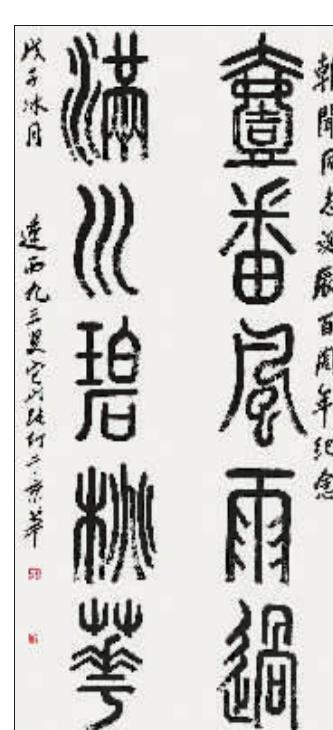
王朝闻先生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学习(1935年,姚继勋摄)



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:我们书店正在安排出版王朝闻先生的两本专著,一本是《接受美学》,一本是《雕塑美学》,书的出版可以更加弘扬王朝闻先生的美学思想。我们正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,隆重推出国家重点项目——《中国艺术科学总论》。出版这套丛书也是王朝闻先生前的愿望,我们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通力合作,把这套书出好,以此来告慰王朝闻先生。

《瞭望》周刊副总编辑陈四益:我带了一本书,王朝闻老师的《新艺术创造论》,1953年版的,当时我买了这本书,后来就喜欢上了他的书。这说明王先生对年轻人的影响之大,受影响的不只是我,当时在系里讨论做学问走什么道路,有人提出两条道路,一条叫“姚文元道路”,一条叫“李希凡道路”。“姚文元道路”要投入战斗,“李希凡道路”是书斋学者式的道路。这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条,最后讨论结果是寻找第三条道路,叫“王朝闻道路”。为什么?因为当时大家觉得我们的文学评论、艺术评论好像是拿一个现成的框子往艺术上套,合的套、不合的就删除。而王朝闻先生的文章,是从大量的艺术实践当中,从成功或失败的艺术实践当中来总结艺术创造的规律。当时的青年学生都很喜欢王朝闻先生的文章,不单是学生,老师也如此。

那时,我没见过王朝闻先生,但是心向往之。到北京之后,记得在东四的时候,向王先生约稿,王



先生就说:“我叫王朝(zhāo)闻,很多人叫我王朝(cháo)闻。”意思就是在“敲打”我们,应该问一下,否则容易弄错。后来他坐下来说,他们(指出版社同志)现在不让我改稿子了,要出版的时候,出版社把小样送过来给我看,我改了之后让他们送过来我再改,改得多了,最后出版社不让我改了。王先生很严肃地说:“我情愿他们把我稿费全部扣了,也不能不让我改。”王先生又说现在他已经成废物了,我说:“您的作品影响这么多的年轻人,很多人都想得到您的指教,您怎么会成为废物呢!”王老师就说那是叫废物利用。原来有很多年轻人想办画展、办画社,请王老师写点什么,王老师认真真去写,有鼓励也有批评,但是最后画展上留下来说的话都是王老师说的一些好话,批评他们的话都被删掉了,所以王老师说他被“废物利用”。他对当下的艺术风气很不满意,但仍对青年抱有很大的希望,希望他们在艺术方面有更大的成就,不要只是为了急功近利,去利用前辈学者。

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沈祖安:作为王朝闻同志的学生和老朋友,我想说几句。王朝闻同志待人很宽厚,他的宽厚表现于不但能够理解别人碰到挫折的心态,也能够容忍人家在工作中的失误,并且都是用热情来对待他们。有一次到杭州龙井边的六通寺去住,前面带路的车因故和我们失去联系。我们到了灵隐寺后,天黑乎乎的看不见,这时来了一个海军女同志,长得很漂亮。我们问她六通寺怎么走,她说就在前面,我带你们去。车开了一段时间,到了一个灯光很亮的地方,我们一看是海军医院。女同志说:“对不起,我到了,你们再往前问一问吧。”我们几个人很生气,心想解放军怎么这么对待我们。这时候王朝闻先生说话了,他说这么晚了,一个年轻女同志保护自己是正常的,我们不去曲解她。从这些小地方都可以看出王朝闻先生的个性。因此,我对现在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有一点

杨辛一起参加美学编写组工作,到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有幸和“美协黑班子”(华、蔡、王)同住一处牛棚。我和他们三位一样,享有“单间”的待遇,但是当时他们都给我很多鼓励,有的时候甚至悄悄说一句话:要忍住。因为他们很有经验,知道我有时沉不住气,很心慌。“文革”后,从王朝闻同志搬到红庙我与他同住一个楼,一直到他搬离红庙,我经常去他那儿请教。所以王朝闻对我的指导、帮助比起现在一个博导带几个博士生的指导要多得多,现在的博士生甚至很难见到博导的面,我那时要幸福得多。

朝闻先生最早的4本书:《新艺术创造》、《新艺术论集》、《面向生活论艺术》,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《喜闻乐见》,在成书之前,我都从报刊上读过。他的文章影响了几代人。我1949年才16岁,抗美援朝当志愿军,都离不开文艺理论学习。后来在我的工作岗位上,我所依靠的就是王朝闻的理论,而且这些理论在我的头脑里形成很深刻的印象。

王朝闻给我的感觉,是大家耳熟能详的,时时刻刻不会忘记的,叫做民主的形式、大众的方向、社会主义的内容。新艺术、新就新在这里。在社会主义之前,有资本主义阶段,有封建主义阶段。人们把社会主义看得很狭窄,于是造成有些人的思维、视野就狭窄,所以一个所谓的新理论出现,好像就会使一些人的理念发生动摇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少白:王朝闻同志是我的忘年交,我跟他有30多年的交往,当然这应当感谢解驭珍老师,有很多电话我打过去,首先得通过她这一关,她总是给我开绿灯。

王朝闻先生对于电影研究

教育做出过一个关键性的贡献,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。电影研究生教育和舞蹈是同时申请学位授予权的,当时他是负责此事的副主任,首先要进行初审,是在1983年开的会。这一次很顺利,电影界的很多初审会的成员都到了。但是具体到学科的时候,还要再经过一段时间,这个时候研究院也已经招生了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许多专业,比如电影,在中国是第一个研究生教育单位,据我了解,在这之前连我国台湾、香港地区都没有。能够办成,影响意义还是很大的。国务院评议委员会正式评议的时候,已经是1983年的秋天。王朝闻发言说,艺术研究院怎么不能办电影研究生教育?他说李少白不能带研究生,那谁带?做出这样个发言时,我不在场,这是当年艺术学科组的秘书、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副主任跟我说的。因为当时已经招生,王朝闻同志又以他在学术界的影响,使这个议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。可见,王朝闻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,观察事物、组织工作,比如学科建设也做得很好。

原《中国美术》主编李松涛:我有三次机缘受教于王朝闻先生:一是在《美术》杂志,他是主编;二是在《中国美术史》编写工作中,他是总主编;三是在国家图书奖评委会,他是总评委、艺术图书评委会主任。我是王朝闻先生一直未毕业的学生。跟随王朝闻先生,受教益最深的是应该以什么精神对待学术研究与写作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在《美术研究》做编辑,向王朝闻先生约稿,他写了一篇《钟馗不丑》,稿件经过多次大修改,我还保留着,是一厚叠。在快定稿前,他给主编金维诺先生写信说:“标题也未想好,论点也还需要推敲。若能不在这期用,

信寄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转我,信中说:“校样给你增加麻烦了。这一回除了有个字和标点是排字上的错误,我做了修改之外,有两处大修改,三处小修改。特别是第19页上删了一整段,很可能影响页码,但是不删就很不好。18页虽然不过是字句上的调动,但是也很麻烦,怕出毛病,务请格外核对清样(有时因为小改出了大毛病)。再,有些地方删掉数字或勾过来、勾过去的地方,也请核对。反正,不让他出毛病就好了。这样,我就不去天津了,请代向郭钧同志问好,我有机会去天津时一定去找他。再,请把改过的清样寄一份给我或者直接寄给作家出版社评论组(它在东总布胡同),因为他们等这一篇稿子放在论文集里,拜托拜托!敬礼。王朝闻 3月31日晨”

我一生看过无数人的文稿,没见过一个人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写作的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德臣:王老在2002年至2003年,多次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提出,努力发掘中华民族的艺术理论精华,广泛借鉴世界各国艺术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,并以此积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学科学的建议。王文章院长采纳了王老的这个建议,于是中国艺术科学总论编辑委员会成立,中国艺术科学总论大型系列艺术学理论著作编辑工作开始,并开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学工程的构建工作。在他最后住院的前一分钟,最终完成了三部著作的修改,一本《审美谈》,一本《雕塑美学》以及《审美艺术心态》。我们在王老百年之后纪念他,永远感谢他,永远怀念我们的老师王朝闻。

(座谈会纪要根据会议录音整理)



王朝闻在创作《汪精卫与陈璧君跪像》(1940年,成都)



《美学概论》编写组于驻地门前合影(1961年) 前排左起:甘霖、洪毅然、田丁、王朝闻、李醒尘、刘纲纪、叶秀山 后排左起:李泽厚、杨辛、于民、周来祥、袁振民、曹景元、佟景韩、刘宁